

担时代使命 攀文艺高峰

陆贵山



时代变革和作家的历史使命

民族复兴需要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可以说有力地推动民族复兴。恩格斯曾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我们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农耕社会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这同样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恩格斯主张艺术理想应当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较大的思想深度”是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然后加以艺术呈现。我们当代中国应当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什么呢？有的作家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我们当代中国应当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向现代化前进的时代变迁、历史变革、社会转型，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新时代给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提供的历史机遇，赋予他们的光荣的时代使命。中国当代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应当是现代化事业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应当是具有爱国志向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顺应、描写和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历史使命。文艺是引领人民前进的火炬、推动时代进步的号角。唱响主旋律、倡导大叙事、提升正能量、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神圣天职。

当代中国作家的时代角色和历史使命是既要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又要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当好人类历史的书记官，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立传，为人民立言立德，为建设者、创业者、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塑像，为普通百姓的生活开新天。当代中国作家应当做新时代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全景式和全过程地展现当代中国的时代变迁、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这是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我们有所领悟地注意到，当代中国的创作界，反映主旋律的、主流的、主导的、主流的大叙事的作家作品还不够多。只有努力塑造创业者和新人形象，才能唱响主旋律，才能展现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从正面、集中地、充分地体现推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创造精神，才能使当代中国文化的面貌和格局发生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强调的。我们所号召的“深入生活”的主要内涵应当理解为指引作家“深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我们所倡导的“扎根人民”的基本要求应当理解为鼓励作家“扎根”到现代化的创业者、建设者、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中去。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人民中那些具有变革意识、创造精神，有能力通过实践力量改造环境和变革社会现实的创业者、建设者、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才能从正面充分集中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作家艺术家只有表现那些蕴涵历史发展动力的人物，才能发掘和激发出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才能切实有效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应当有意识地引导、组织一些有志向、有追求、有信仰的艺术家投身到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培育大作家，用大手笔书写大叙事，表现大事业。

攀登艺术高峰的伟大作品往往能反映和呈现一个历史阶段的整体风貌，无愧为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史诗般的精品力作。达到艺术高峰的作品能够体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融合，能够体现真善美的完美融合，能够体现历史的观点、人民的观点、文艺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的完美融合。文艺的批评标准可以蕴涵和折射文艺的性质和功能。综上所述，可以提炼出一部作品是否达到艺术高峰的判断标准：能否反映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揭示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能否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表达人民的福祉和意愿，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是否具有震撼力和穿透力的思想深度；是否具有高雅的艺术格调和杰出的审美品位，如此等等。

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文学创作和作品主要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塑造现代化的创业者和建设者，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对加速和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是否能够“改变旧环境”作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根本标志。只有运用实践理性，通过实践手段，改变旧环境的人，才是新人；不能改变旧环境，无论怎样宣称和表

白自己是新人，实质上仍然是旧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使人们“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当代中国面临着历史大转折和社会大进步。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宗法制小生产农耕社会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发展、强大富裕文明的现代化社会，这是每个当代中国人和当代中国作家面临的令人鼓舞的现实。这个现实富于理想，但不是乌托邦，是具有充分的现实根据和物质基础，是经过艰苦奋斗可以实现的。这个伟大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是通过实践干出来的，然后才是写出来的、唱出来的和演出来的。真正改变人的生态和命运，使当代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使当代中国成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高度发达国家，必须靠掌握实践理性并具有实践力量的人，去改变旧环境，创造新世界，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这些掌握实践理性并具有实践力量的人的主体正是新时代中国的创业者、建设者、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

纵观当代文艺历史，几种题材的创作和作品，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种是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过去是现在的昨天，将来是现在的明天。那些描写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优秀作品，激励人心，使我们难以忘怀，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历史性的宝贵启示。这些作品表现出来的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光照千秋；这些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从领袖人物，到将帅形象，到普通战士，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与人民血肉相连，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以及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格力量，坚忍不拔和无坚不摧的钢铁意志，书写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史。这是一群纯正、忠诚、坚定和英勇无畏的人。这些人顶天立地的人，是开天辟地的人，是翻天覆地的人。这些大写的字铸造了我们值得骄傲的过去，是革命历史留存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

一种是科技战线题材的作品。近代中国，由于科技的落后，国力衰微，人民饱受欺凌和屈辱。科技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这些作品礼赞了科技战线取得的开创性的赫赫实绩，塑造了一批批灿若群星的科学家的光辉形象。他们无私献身，排除万难，把“两弹一星”送上天空。蘑菇云的升起，像科学家们为人民放射的礼花，绽开得绚丽动人。这些怀有“普罗米修斯情结”的人们为祖国取来圣火，造福人民。这些作品把科学家身上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为一体，使人们感受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对立的。科学精神是人的科学精神，体现着人文精神的崇高风范。用这种崇高的科学精神武装起来的人和所凸显出来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的标志。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杰出的科学家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像姊妹花，并蒂莲。人文精神如方向盘，科学精神似发动机。这些作品塑造的人民科学家的典型形象，用他们研发和创造的大国利器，壮了国威军威，使中华民族挺直了坚韧的脊梁，抬起了高傲的头颅。

一种是农业题材的作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拥有10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广大农村的农业改革是整个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依然是土地问题。土地资源如何发掘和利用，转换并增值为农民的财富，是至关重要的。一些农业题材塑造的农业改革的带头人正是能够通过实践变革，改变旧环境，创造新生活的创业者、建设者和新人形象。他们动员和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艰苦奋斗，改天换地，把沙漠变成绿洲，把荒山秃山变成金山银山，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把没有生气的田野变成了充满希望的田野。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建设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实现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书记官”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作家艺术家作为人类历史的书记官，

书写人类历史应当秉持正确的历史观。作家艺术家所创作的历史文本应当正确揭示历史变革的根源、对象、动力、目的和前途，表现社会转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充分展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创造精神以及社会进步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幸福感。应当反对虚无的历史观。我们注意到，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些对革命史怀有异见的人，掀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浪。他们否定公认的革命史实，毫无节制，甚至肆无忌惮地揭露革命过程中的所谓阴暗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和英雄人物进行颠覆性描写，对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精神偶像进行攻击和篡改，伤害了人们热爱英雄的真挚情感。这种言说和书写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限，缺乏善意，放肆轻率，解构历史，颠覆历史，令人无法容忍。这种通过“去革命化”“去英雄化”，达到“历史虚无化”的胡编乱写，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泥潭，是对历史的最大背叛。

应当抵制倒退的历史观。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工业现代化进程也确实给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世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有的文学家从简单的道德层面，赞赏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和谐，迷恋宗法制的社会文化结构，对工业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示不满。有的作家对农民古老传统的生存方式非常熟悉，却以空乏的艺术手法，对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出质疑，进行颠覆性描写。他们迷恋昨天的梦幻，对过时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概加以美化与诗化，否定农村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作家艺术家应当防止和克服陷入历史倒退论的迷雾。长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制，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从全局、主导方面和发展趋势上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应当理性地、愉快地向饱受屈辱、充满苦难的过去告别。

应当消除幻想的历史观。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应当理解成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和实践。只有依靠强大的社会实践的力量，才能真正地实际地改变人的生态，推动社会的进步。一些学者和作家非常崇拜西方学术宣扬的语言幻想和审美幻想。从语言幻想方面来说，他们认为通过语言的重新编码，改变语言结构，发动语言的人本主义革命，可以影响和促进现实生活的社会革命。实质上语言革命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重组语言，并不意味着使人的生态和现实生活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是一种语言的乌托邦。从审美幻想方面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诸如“审美救赎”“审美乌托邦”“诗意地栖居”和“以审美代宗教”等提法，都带有明显的假定性和幻想性。美好的幻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幻想的胜利往往掩盖和遮蔽着现实生活的失败。这种苍白、空洞而虚假的语言幻想和审美幻想，不可能照亮人们思想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对鼓吹人们在“纯理论”和“纯审美”领域中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他们把反对这种幻想视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原理”，是不无道理的。

有诗云：“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当代中国作家一定能攀登艺术的高峰。攀登艺术高峰，关键在队伍。有理想、有志气、有信仰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攀登艺术高峰需要培育拥有攀登艺术高峰能力的大师级作家艺术家。他们扮演着人类历史的书记官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双重角色。他们成长为文艺巨匠，需要经受时代变革的洗礼，需要接受人民的哺育，需要经过艰苦生活的砥砺，需要练好内功，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无限风光在险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作者简介

陆贵山，1935年出生于辽宁辽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50余年。著述300多万字，如《艺术真实论》《审美主体论》《宏观文艺论纲》《人论与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潮》《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等。被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分别授予“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和“马列文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海报

收视率破5、豆瓣评分8.8、微博热搜居高不下……最近，55集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备受好评，获得了口碑、收视的双丰收，作为现象级作品，展示了国产电视剧的创作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高举反腐利剑，扎牢制度笼子，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的高度，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决心和魄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文学艺术以饱满昂扬的姿态，积极书写和记录伟大实践，积极表达社会现实、回应人民关切、展现正义力量，体现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始终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他看到，街头“无人游手好闲”“人人可上于主席毛泽东”。黄炎培坦言：“延安五日中午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保证政党未来的执政稳定？有没有办法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一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那就是靠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会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直面“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作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的判断，鲜明提出有腐必反、有贪必惩、反复告诫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高度。十八大以来，一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党纪国法，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级领导干部落马，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体现了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原则的鲜明态度，体现了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显示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在1371个字的贺词里，“正风”“反腐”高频出现，给海内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反腐力度，在国际社会产生强烈反响，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捍卫党纪、自我净化、自我革新，也给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黄炎培先生所疑虑的“历史周期律”的明确回答。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赢得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够重拳出击，惩贪反腐，这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人民的名义》始终以高频率高热度受到观众追捧，关键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最受百姓关注的话题，党中央如何从严治党，如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这部反腐题材作品的热播，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创作团队对这部作品严谨的创作态度，30余位老戏骨不计报酬的积极担纲、精湛演技，越来越成熟、追求高品位的受众人群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和热切参与，等等。

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如此受民众关切，是因为政治生态环境优劣，从政行为规范与否，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精神风貌，关系到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政权和民族的存亡。一个污浊的政治环境，政治行为必然失范，人民不能公平生活。而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崇尚权力、贪腐横行，让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公序良俗，社会将在

失衡状态下更加不公平。党内腐败现象不及时遏制，就会使党变质、变色，我们历经艰难开创的千秋伟业将毁于一旦。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制度建设、司法体制改革都是题中之义，从严治党是为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种意义上，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没有退路、必取胜利的战役。

《人民的名义》塑造了一批鲜活的正人物形象：侯亮平、沙瑞金、陈岩石、赵东来、李达康，他们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正义必胜、人民必胜的真理。电视剧还生动展示了高育良、祁同伟、丁义珍、刘新建等一批腐败分子堕落的过程，提醒我们诱惑就在我们身边，官员必须时时告诫自己，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和初衷，时时提高警惕，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廉洁才是立身之本，才是最大的平安。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播，不在于如何展示腐败，而在于如何惩治腐败，始终传递向善、向上、向美的价值观，这恰恰体现了中国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生机和力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领域，现实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被广泛运用，并产生了大量经典作品，对包括中国文艺在内的整个世界文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远者有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经典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近者有这两年热播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安居》《欢乐颂》《小镇大法官》《刑警队长》《马向阳下乡记》《父母爱情》。这些作品有一个共性，它们都反映了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始终不渝地引导广大受众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文艺从发生到发展，无论怎样地虚构变形，怎样地创新创造，文艺作品记录和探索人类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宗旨不变，文艺创作的评价维度就不会改变，它的历史性原则也就不会改变。这才

是我们应该坚持、坚守的文化立场；辽阔的现实主义。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被抛弃，甚至被窄化、弱化，以至于文艺创作中出现了系列问题，比如抄袭模仿、千篇一律、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大多是因为创作主体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出了问题。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和认识，即便技巧再好，方法再新，作品也只能成为文字游戏、影像游戏、形式游戏，甚至成为文化垃圾。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经济社会不断进步，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如何记录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表现如此重要的历史节点，探索这些丰富奇妙的体验和经历，广大文艺工作者使命在肩，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得民心的人和事都要歌颂，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行径都要揭露、鞭笞。揭出病苦，进行救治，我们的肌体会更加健壮，将更加朝气蓬勃地领导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轻装前进。我们必须心怀祖国人民，响应时代召唤、追求艺术理想，始终做时代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努力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方能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广阔未来。

重建辽阔的现实主义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观后

方舟